

## 国际学术界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

孫 晔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弗洛伊德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叶即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于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国际心理分析学会。

1908年维也纳和苏黎世两地的心理分析学会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弗洛伊德信徒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召开了一次会议,实际上这就是第一次国际心理分析会议。这以后,这个组织不断扩大,其分支机构遍设于世界许多国家,拥有为数颇多的会员。现在美国可以说是它的大本营。

由于曾经参加萨尔茨堡会议的美国的弗洛伊德信徒布利尔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成英文并大力加以提倡,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的本能论在美国学术界的流传事先为弗洛伊德主义的输入和传播开辟了道路,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美国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条件适合于这个反动理论的滋长,于是弗洛伊德主义便在美国广泛流传开来,近年来已发展成为美国资产阶级维护其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进步、科学进步的主要思想武器。1950年美国成立的“国家心理战略局”就是以弗洛伊德主义为其主要的指导思想的。无怪乎美国著名的进步精神病学家乌尔提斯说,美国已成为弗洛伊德主义的“第二祖国”。

这为数众多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每年通过其大量的书刊散布其有毒害的影响。

这个学说最初只是作为解释神经症病因的一种观点而出现的,但是后来它不断地向外扩张,扩张到整个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文学艺术等等领域中去,俨然成为一种万能的哲学观点乃至体系了。近年来甚至于也被应用到工业上去了。例如英国的一家工厂工人罢工了,厂主请来了心理分析家。心理分析家得出的结论是:罢工的原因不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而是恋母情结的表现,工人反对父亲的倾向在这里象征地表现为反对工厂主了。美国心理分析家则把工人为反对工厂主的斗争解释为工人死亡(侵略)本能的表现。弗洛伊德主义之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受到热烈欢迎,其原因是一目了然的。

\* \* \*

科学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而且总是以唯物主义的胜利为结束。弗洛伊德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流传并不是没有受到反对的。在苏联由于谢琴诺夫和巴甫洛夫的唯物主义生理学说深入人心,影响广泛,在学术界占绝对优势,所以弗洛伊德主义在苏联没有可能得到传播,这且不谈。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它也遇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科学家的尖锐的驳斥。

远在3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考特威尔和巴特列特,就曾著文反对弗洛伊德主义,指出它的心理学的原始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因为人的心理被说成是取决于不依社会生活条件为转移的天生的意向。同时也指出了它缺乏现代科学的证据,纯属

臆造。

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更尖锐了

1953年英国著名的弗洛伊德主义批评家奥科诺尔发表了一篇着重讨论心理分析疗效的文章。他举出的数字使弗洛伊德主义者哑口无言。根据心理分析文献中的资料,应用心理分析技术后痊愈和好转的人数约达60%。然而如果看看对施以各种心理分析治疗和未加治疗的精神症患者诊后病历研究的资料,则这个数字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根据1951年公布于“心身医学”杂志上的梅尔斯等人的资料,把30个这类的诊后病历研究的结果概括起来,得出的结果是,全然未受过治疗的病人的机能失调恢复的人数比受过心理分析治疗的人数还要多一些。这个致心理分析于死命的数字表明,在心理分析治疗条件下出现的良好的效果主要是由于时间的进展和病人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而跟其它因素关系较少。

还有一些批评家利用统计数字客观地审查了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1950年法勒就曾对弗洛伊德主义关于性的个体发生的理论进行了审查。结果证明,绝大多数的儿童都不存在任何恋母情结的特征,童年性慾的特征。同时指出,弗洛伊德主义多么严重地忽视了环境和教育对儿童性发展的影响。

美国进步的精神病学家福斯特的著作“神经症患者、他的环境和内在世界”(这本书已被译成俄文,苏联心理学家鲁利亚教授为该书的俄译本写了序言),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批判。作者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驳斥了弗洛伊德主义对待神经症的基本观点。作者认为神经症的病因不在于潜意识的无意识里,而在于客观的、外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里。因而神经症的治疗就不应当是造成消除这些被排挤的情态的条件的心理治疗的技术,而应当使病人正确地理解导致病态体验的真正根源,分析其社会关系,建立以对外界环境的正确理解为基础的正确行为。福斯特主张的心理治疗的基本任务是跟对神经症患者的重新教育的任务密切联系着的。

美国进步的哲学家威尔斯的著作“弗洛伊德及其学说”从弗洛伊德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方面阐述了 this 学说的缺乏科学根据的臆造性质。

美国的巴甫洛夫学会也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此外在一系列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特别是在1957年于德国弗莱堡(西德)举行的专门讨论弗洛伊德学说和巴甫洛夫学说的会议上,也对弗洛伊德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弗莱堡的会议上德国科学家米特等人把弗洛伊德学说和巴甫洛夫学说对照起来,批判了弗洛伊德学说的荒谬性。

以上所述的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只是举了几个比较显明的例子而已,但是就是这几个例子已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弗洛伊德主义的力量是在不断地增强着。

\*

\*

\*

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虽然日益尖锐化、具体化,但总的说来,仍不够彻底、不够严格。有些批评家甚至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某些论点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认为这些论点具有真理性。象著名加拿大神经学家潘菲尔德,罗素,印度的一些神经学家以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科学家就具有这种看法。甚至于英国著名的弗洛伊德主义批评家奥科诺尔也认为可以从这个学说中分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来,如果能去掉弗洛伊德主义给它



最后,弗洛伊德主义内部还有另一种新的动向。大家知道,由于弗洛伊德本人后期长时期的反生理学的倾向,遂使心理分析学说形成了反生理学的传统。这样一来,就使它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陷入绝境。近年来电生理学研究 and 神经元图分析研究的发展,重新阐述了皮层下结构的的活动对脑的最复杂的活动的活动的影响。此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对这些新资料作了不正确的概括,这种情况引起了面临绝境的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很大的兴趣。他们一反过去的反生理学的方向,而企图利用神经生理学的这些新资料来论证其基本论点:起源于皮层下的激情和冲动决定人的行为。例如上文提到的美国弗洛伊德主义者丘比在第十四届国际心理学会会议上的发言就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事实上正如苏联神经学家巴辛指出的,这些新资料只有从巴甫洛夫关于皮层下结构有提供张力的作用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

\* \* \*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苏联医学科学院四个研究所于1958年联合召开了一次专门批判现代弗洛伊德主义的会议。会上从各个方面,从神经生理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科学等方面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论点和现代弗洛伊德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相当透彻的批判分析。现在我们就结合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的文献谈一谈这个学说的几个基本的、作为其支柱的论点以及对这些论点的批判。

1881年弗洛伊德从医学院毕业后在维也纳一家医院里工作。在工作中他很快就遇到了缺乏明显的机体性原因的神经症问题并对之发生了兴趣,立志要弄清楚这个谜。为此他动身去巴黎,向当时最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沙谷求教并长时间从事于歇斯底里以及常常伴随这种疾病的麻痺现象的研究,终于在1895年与布列依耶尔一起发表了“歇斯底里的研究”这本著作。在这本著作里提出了歇斯底里征状起源的理论,建立了“心理能量”、“排挤”等基本观点。他假定,从事某种行动的冲动好象是一种“心理能量”的储备,这种能量力求实现出来。这种“心理能量”如果由于某种原故(与之敌对的趋向的反对)不能实现出来,那么它就要寻找迂回的出路,这种迂回的释放能量的方法就表现为神经症的征状。这里已为心理分析的整个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排挤”概念是核心,而“心理能量”概念又是“排挤”概念的基础。

这以后,弗洛伊德并没有从生理学上去论证自己提出的假定,而是走上了臆测的神秘主义的道路。他认为,既然我们对于脑活动的生理机制了解得很少,心理学的研究就无须以生理学为依据。

他把被压抑的冲动称之为“意向”,“无意识”,“它”,其中主要是性的意向,把压抑冲动的心理因素称之为“我”,“意识”,“超我”,“检查者”,认为“超我”,“检查者”位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在弗洛伊德看来,治疗神经症就是要把无意识导入意识,使“心理能量”得以中和。

“心理能量”的中和首先要求揭露被排挤的冲动,并使它们以伪装的形式进入意识,于是弗洛伊德提出了心理分析的三个方法:自由联想,释梦和移情,这就构成了一直应用到今天的心理分析技术。他认为这三种方法都能揭露被排挤的冲动使之以伪装的形式进入意识。后来他把以伪装形式进入意识的途径总结为六种:自由联想、梦、移情、神经症症状、笑话、遗忘以及各种错误,如口误和笔误等。

更进一步,弗洛伊德把他的理論应用到社会現象的解释上去了。他認為道德、宗教和社会都起源于“恋母情結”,認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具有天生的侵略(死亡)本能。这里弗洛伊德主义的反动性是十分明显的,无須多談。

如上所述,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基本論点是被抑制的行动冲动能成为致病因素,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意向冲突的致病性观点。这一点被許多人用来作为調和巴甫洛夫学說和弗洛伊德学說的論据。

不錯,意向冲突的致病性观点本身是一个普遍的原理,巴甫洛夫学派在这方面进行过相当多的研究,如大家熟悉的彼特罗娃、鲁利亚等人都作过許多研究。他們的研究証明,严重的机能性障碍和机体性障碍的发生极可能是由于所謂“冲突”和感情的矛盾引起的。

然而,意向冲突的致病性事实是一回事,弗洛伊德对这个事实作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却又是另一回事。

大家知道,彼特罗娃曾在动物身上形成了实验性神經症,認為这是神經過程的剧烈冲突的后果,而弗洛伊德却認為神經症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这里一方面显示出我們所謂冲突与弗洛伊德所謂冲突的实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弗洛伊德把促成神經症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条件抽象化了,把它看成是文明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正如苏联神經学家巴辛指出的,弗洛伊德在这里犯了几个大錯誤。

无数的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証明,由冲突引起的机能性障碍在絕大多数的情况下仅反映神經過程的正常相互关系的破坏,而与冲突的心理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而弗洛伊德却肯定,冲突的性质与所引起的临床征状的性质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临床征状以某种象征的形式表現着被抑压的意向。例如,假如想与某人跳舞的意向被抑压,就引起象步伐失調这类的机能障碍,步伐失調成为被抑压的意向的象征性表現和代替物。这就是弗洛伊德的象征性理論。

弗洛伊德提出了象征性理論后,对象征的解释是极端随意的,对障碍与其象征性表現之間的关系既不作实验检查,也不作統計检查。下面我們会看到,这种极端的随意性是心理分析的体系的一大特点,貫串到各个方面。

在歇斯底里的情况下有时可以看到情緒冲突的心理内容与机能障碍的性质之間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具有严格的邏輯性的,是具有适应性的,例如,假如运动麻痺可以使病人免于作那种他所不愿作的活动,則会产生歇斯底里性运动麻痺。既然不能把正常行为看成是正常活动动机的象征性表現,同样也不能把这类失調看成是被抑压的冲动的象征性表現。

其次是行动冲动在它沒有被意識到也可能影响人的行为的观点。这个事实是无須怀疑的,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弗洛伊德首先提出的,弗洛伊德更沒有給这个事实提出任何科学的闡述。

大家知道,巴甫洛夫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复杂的体验可能被抑制,而成为无意識的东西,但它并未消失,将来当抑制弱化时,它又会重新进入意識。

近几十年来有相当多的实验研究証明了这一点并給予了科学的解說。例如普拉托諾夫等人的資料証明,被催眠者能够長時間把复杂的指示保持在无意識状态中,一旦相应的

条件出现，就会实现出来。烏茲納捷学派的大量实验事实证明了无意识的心理定势对意识范围的影响，等等。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心理生活就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斗争，并且最后总是无意识获胜，无意识的冲动是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与科学的解释相差多远啊。

第三是把意向看成是机能紧张结构，即“心理能量”的观点。如上所述，“心理能量”的概念是心理分析学说的基石，心理分析的其他概念都建立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但弗洛伊德并没有给这个对他如此重要的概念以任何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揭露。他的“利必多”概念是纯粹臆造的。

这里我们又一次要对事实和弗洛伊德对这个事实的理论解说采取分别对待的态度。

精确的实验研究早已指出，已形成的行动冲动的阻抑和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性的增高对生理和心理过程有多么深刻的影响。如果说这些研究尚未揭露意向紧张性的神经生理基础，那么无论如何可以说，它们证明了这类的紧张性是存在的，从这种紧张性引起的，并且当行动冲动被实现后便消失的那些生理和心理反应上可以看出其动力来。

虽然情感紧张性的生理基础问题迄今尚未十分明了，但上述这些研究无疑证明，是可以通过实验研究的途径加以探讨的。而弗洛伊德所走的却是简单化的主观臆测的道路。他把这种紧张性看成是纯粹精神的力量，这里弗洛伊德就跟生物学中的活力论挂上了钩。

综合上述的一切，可以明显看出，弗洛伊德初期虽然接触到了一些科学事实，但由于他的基本思想观点的错误，使得他对这些事实作了极其荒谬的解释。

弗洛伊德的基本思想观点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德国反动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尼采甚至被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他们的哲学是唯意志论，认为统治世界的是非理性的意志，人类意志是第一性的，从而否定社会历史的进步，形成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尼采甚至把群众叫作“畜群”。弗洛伊德的哲学观点正好跟这种哲学观点一脉相通。在弗洛伊德看来，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意向决定人的行为，是头等重要的。他认为社会的进步是造成神经症的原因。他认为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这种兽性的无意识的意向的奴隶，只有少数人才能抑制这种意志，使之昇化。不难看出，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哲学观点跟叔本华和尼采的反动的哲学观点是多么相象。可见，弗洛伊德主义之所以能在今天的美国广泛传播，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以至成为其第二祖国，不是没有深远的根由的。

弗洛伊德主义今天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是科学心理学的死敌，因此不断地对其各种表现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深入的批判是当前进步的学术界的一项严肃的任务。

弗洛伊德主义在解放前的我国也有过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今天也不能说已彻底被根除，因此反弗洛伊德主义的斗争对我国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П. П. Бондаренко, М. Х. Рабинович. Вопросы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с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фрейдизмом (К итогам научн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четыре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Медицинских Наук СССР", № 1, 1959.

- [2] П. П. Бондаренко, М. Х. Рабинович. Науч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вопроса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с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фрейдизмом.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2, 1959.
- [3] Ф. В. Бассян. Межинститут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ри Президиуме АМН СССР по вопросам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с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фрейдизмом. "Журнал невропатологии и психиатрии имени С. С. Корсакова", № 5, 1959.
- [4] Ф. В. Бассян.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фрейдизма.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Медицинских Наук СССР", № 1, 1959.
- [5] Ф. В. Бассян. Фрейдизм в свет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научных дискуссий. "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 № 5 и 6, 1958.
- [6] Гарри К. Уэллс. Зигмунд Фрейд и его учение.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6, 1956.
- [7] Ф. А. Вельгеша. "Фрейд и Павлов" (Отчет о фрейбургском съезде). "Журнал невропатологии и психиатрии, имени С. С. Корсакова", № 11, 1957.
- [8] Ц. Михалова.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философи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3, 1958.
- [9] А. Метте. Замеча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понятия Фрейда о регрессии. "Журнал невропатологии и психиатрии имени С. С. Корсакова", № 1, 1958.
- [10] В. М. Мороз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волюнтаризма и психоанализ Фрейда. "Журнал невропатологии и психиатрии имени С. С. Корсакова", № 5, 1959.
- [11] Д. Б. Фурст. Невротик, его среда и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ир. Москва, 1957.
- [12] С. Л.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Н. С. Мансур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перед судом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и психиатр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4, 1959.

(1959年7月8日收到)